

闽东“咸水”妈祖与“淡水”妈祖*

——以霞浦沿海渔村和福安沿江集市为例

蓝炯熹

本文以福建省霞浦沿海渔村和福安沿江集市的妈祖婆信仰为例，比较二者在鼎建官庙、信仰人群、置办庙产、祭祀活动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了闽东咸水区与淡水区妈祖信仰的地方性特征，以及妈祖信仰从闽东咸水区传播到淡水区的过程。

关键词：咸水 淡水 妈祖信仰

作者蓝炯熹，1948年生，福建省宗教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闽东”的地理方位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清代，一般指福建省福宁州（后为福宁府）地界。现在常特指福建省宁德市所辖县（市、区）份。本文选取清代以来与福宁府从属关系相对稳定的县份霞浦与福安为参照系，讨论闽东的妈祖信仰问题。

闽东人称海水为“咸水”，故清乾隆《福宁府志·地理志》在言及“官井洋”时曾有“洋属咸水，中有淡泉涌出”之句。从地理位置看，霞浦县“三面滨海”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沿海县份，其沿海渔村属“咸水区”；而“福安县治，去海稍远。”除了南部小部分靠海外，大部分陆地的内河水系较为发达，其沿江集市、码头当属“淡水区”。

妈祖，在闽东称为“妈祖婆”或者直称“阿婆”。清代，福宁府所属各县，均建多处妈祖庙。“所建固未足当大观也，而宁人每逢诞日，少长咸至，供献丰洁，冠履杂沓，诚诚恳恳。”福宁各级官员则每年“循例当祀天后”^①举行国家春秋祀典。闽东民间祭祀妈祖婆，在祭祀的方式与内容上与官方不尽相同，由于咸水区与淡水区的人居状况和经济生活的不同，其妈祖婆信仰人群的主体结构和祭祀活动也存差异。

通过对咸水区与淡水区妈祖信仰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解读两个区域妈祖婆信仰的地方性特征，而且还可以探索妈祖信仰传播与扩展过程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事象。

一、宫庙鼎建与信仰群体

霞浦咸水区妈祖宫庙鼎建的时间较早，其官方祭祀天后的庙宇在县城东郊利垵，

* 本文系国家十五规划社会科学课题《妈祖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研究》（项目批准号：03BZJ010）阶段性成果。

^① 李拔《福宁府志》卷之三十四，《杂志·坛庙》。

据民国《霞浦县志·祠祀志》载,天后庙,“原州(指福宁州)建于利埕。”明代名“灵慈庙”。“旧在东门内,嘉靖辛酉(1561)毁,万历十三年(1585)境内合贗重建于鳌桥外。鼎革后,屡经修葺,至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间,飓风复坏,前郡守余文仪,霞浦令胡世钰率邑人重建于东郊观音阁旧基。”妈祖信仰始于北宋,“宣和间,初赐庙额曰‘顺济’。”^①而霞浦松山妈祖庙,“建自宋朝,在洄澜岸口。”^②足见霞浦建庙之早。

福安淡水区妈祖宫庙鼎建的时间,则晚得多。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鼎建时间在清代。福安官方祭祀天后的庙宇在城内的龟湖山,据乾隆《福宁府志·杂志·坛庙》载,为“乾隆六年(1741)建”。是目前所知福安鼎建时间最早的妈祖宫庙。据现存明清两代的《福安县志》记载,明之前,福安没有妈祖庙。虽然,万历《福安县志·营缮志·坛祠》载:有顺济行宫“正统初,建祠洋头湖上。”但却内祀临水夫人,临水夫人“唐大历中传庐(闾)山术,居古田临水殿,封崇福广利太后元君”。光绪《福安县志·典礼·祠庙》延续万历志的记载。可见,福安“顺济行宫”并不祭祀妈祖,也未载入“天后庙”之列。光绪志另列的“天后庙”条目中明确记载福安域内各天后宫庙鼎建时间的是,坦洋庙,道光三十年(1850)初建,光绪二年(1876)重建。溪柄庙,道光间建。甘棠庙,光绪八年建。绣溪尾庙,嘉庆二十五年(1820)建。棠濂庙,嘉庆四年建。^③这些庙宇的建筑时间都晚于龟湖山天后庙。

综上所述,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妈祖信仰现象至迟在宋代已远涉咸水来到了霞浦县,自古以来兴化湾(包括湄洲岛)渔人便有春夏季转场到霞浦三沙湾捕鱼的传统,同时,与霞浦县紧密相连的福鼎沙埕港便有大量的来自海边的兴化移民。^④这种自然与人文的联系,使得宋代霞浦妈祖宫庙的鼎建成为可能。到了清代,历史悠久的松山渔村妈祖庙宇便有了“天后圣母行宫”命名的资质。^⑤而福安较迟鼎建妈祖宫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福安淡水区与霞浦咸水区有水路相通,但是要将海洋神灵引入淡水区,得靠渔人舟子来实现,而福安沿海不属于兴化湾渔人捕捞的范围,只有凭借海上贸易的发展才能提供这种条件。在明代之前,闽东的海上贸易并不发达,清初的海禁又加固了咸水区与淡水区的阻隔。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翌年福建开禁展界,闽东海上贸易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随着“五口通商”后福州港的兴起,以及咸丰、同治年间闽东茶叶市场海外需求量的剧增,加之闽东三都澳海关的建立,使得闽东咸水区与淡水区的关系迅速紧密起来。此时,福安已是闽东茶叶大宗出口的重要市场。万历年间福安集市仅3处,到了光绪年间福安集市已多达24处。除了7处在福安城内外,其余的都分布在福安的多条水域。^⑥同时,随着处于咸水、淡水交汇处的赛江集市的逐步兴隆,以之为依托,

^① 李拔:《福宁府志》卷之三十四,《杂志·坛庙》。

^②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③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之十三,《典礼四·祠庙(附)》。

^④ 孙曙红:《湄洲祖庙与松山天后宫的关系》载《两岸学者论妈祖》(第二集),第34页,香港闽南人出版公司,1999年版。

^⑤ 现存的清乾隆五十八年《松山澳靖海宫田园析租赐宫碑记》石碑载,松山“山之麓旧有天后圣母行宫。”

^⑥ 参见万历《福安县志》第一卷,《輿地志·集市》、光绪《福安县志》卷之三,《疆域》。

福安便逐步成为山货、海货在闽北腹地与闽东诸县流通的枢纽。另者，海神妈祖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奉文各府州县一体建庙奉祀。”^①因此，在“一体建庙奉祀”的敕令昭示之下，妈祖宫庙的相继出现，除了有乡间里人乐于捐建的缘由，也必然有官方奉旨倡建的动因。闽东人妈祖信仰的形成应该有一个从咸水向淡水逐步传递的过程，鼎建宫庙条件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霞浦咸水区和福安淡水区鼎建妈祖宫庙的主要倡捐者不同。前者以渔人为主，兼有海防军士；而后者以商人为主，兼有庠序士子。

霞浦县咸水区“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藉海为活。”“自外江七都港沿海岸而西至东冲，内延官井洋、东虎洋、盐田港，其间居民，虾蟹、鱼鲜之属，莫不各从其事。而三沙面临深水大洋，居民远涉于台湾、漳、泉而外，所得多远海之货，比（福）鼎、（福）安、（宁）德诸港内者迥不相侔，故贩鱼者特称之曰：‘三沙货’”。虽然，“渔人之于海也，覩云知风，占候知性。”^②但是，海洋凶吉莫测，渔季丰歉难定。如渔村谚语所言：“海水没门限（门槛）”、“行船走马三分命”，渔村伴海为生，大海决定渔人命运。宋代便接受妈祖信仰的霞浦渔人，奉妈祖婆为“海神”，鼎建阿婆宫庙，以求海神保佑，获取妈祖婆全方位的庇护，已然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渔人是闽东妈祖婆信仰之最为必需与最为虔诚者。于是，霞浦地方志中便有渔村盼望沐浴妈祖婆灵光的记载：“‘三南’沿海，各村创建（妈祖庙）不一，居民风涛绝险中，呼吁立济。”“里人清训导张光璧有记：咸丰己未（九年，1859）七月初七，广艇撞入，来商去劫，约二百余人，枪弹如雨，民无所措，祷于后。其夜，邻村见竹江有灯千余盏若巡逻火，翌日询乡人杳然无有。旋起东北风，猛烈异常，匪艇翻掀如叶，转之潭坞。圣母之灵不可无记。诗曰：‘炮震弹飞海浪奔，江村儿女尽销魂。盈盈一水无生路，簇簇群凶任触藩。圣母有灵驱鳄去，匪帆无计肆鲸吞。非徒博得安澜庆，捍患功深显复恩。’其余历迹，不可胜记。”^③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加深了渔人的妈祖崇敬与膜拜，咸水区有经济实力的渔村便以鼎建妈祖宫庙为己任，不遗余力，付诸实施。以霞浦县竹江村为例，竹江为岛屿村落，“环乡皆江也。……舟楫往来，直通四海而遥。”“乡之人以水为田，春冬则蛤、蛎资生，夏秋则捕鱼为业，家小康者多事诗书。”“乡分前、后澳，张姓居前澳百余家，名曰‘繁英境’；郑、陈二族居后澳二百有余家。三姓外，他族綦寥寥也。”^④乡之东南隅，建宫庙祀天后，称前澳天后宫，为张姓所建。正座为清代建筑，偏座为明代建筑。偏座原名顺济庙，清康熙二十三年扩建正座后并成天后宫。^⑤村西建后澳天后宫，是郑、陈二姓所建，天后“皆岁时伏腊，郑、陈二姓所奉为主神者也。”^⑥后澳天后宫神龛石座旁镌刻“岢嘉庆捌年（1804）葭月吉旦”。竹江对岸

^①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②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十八，《实业志》。

^③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④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六，《城市志》。

^⑤ 笔者在竹江村实地调查资料。

^⑥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六，《城市志》。

的沙江村也是纯粹的渔村,明清时期称为“沙洽村”,该村于乾隆年间欲重建天后宫,拥有较大面积海堤的俞、黄、曾、汤四姓渔人祠堂纷纷捐其族产于鼎建宫庙的用地与资金。重建的天后宫气势宏伟,占地 2700 平方米,内有百级台阶,3 座戏台,霞浦渔人俗语称:“沙舌(霞浦方言,即沙洽)妈祖宫,三十六天井。”^①渔村以渔人家族名义独建或合建天后妈祖宫庙,是咸水区妈祖信仰的特色之一。据民国《霞浦县志·祠祀志》载,除了以上所述的利埕、松山、竹江、沙江的妈祖宫庙外,“其余里都建宫”者有建于清乾隆间的三沙东澳境宫庙,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的东冲宫庙,建于明嘉靖年间的东冲下位塘宫庙和建于清同治五年的盐田下街宫庙等。以上均为沿海渔村的妈祖宫庙,其筹建者大都与当地渔人有关。

除了渔人乐于捐建妈祖宫庙外,驻防的军士也是主要的倡捐者。民国《霞浦县志·祠祀志》载,松山天后宫“清乾隆五十八年,郡守甄时济重修。……嘉庆十六年复鸠工增建。”今宫庙正殿悬梁上尚留墨字:“总镇福建延、建、福宁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吴万福前重建”,“大功福主福宁知州胡尔慥前禧舍银贰拾、□□□指挥官张□□首舍银贰拾,祈保高陞”。民国志还记载,三沙东关境妈祖庙,“清嘉庆间左营水师员弁捐资建”。东冲天后宫,“旧宇缩小,年久倾圯。乾隆四十八年,汛弁陈凯专倡捐拓地盖造,有吴源立匾以记其事。”松山、三沙、东冲等处都是霞浦县海防要地。乾隆《福宁府志·地理志》载:三沙港口“福宁门户,稽查最为要冲。现设福宁镇标千总一员,带兵防守。”东冲口“最为要冲。今设福宁镇标千总一员,带兵防守。”清嘉庆八年汛兵六十八名“分防松山汛”,松山汛兼辖“赤岸桥、罟溪塘……后墩塘,兼渔并炮台水寨等处。”^②以上霞浦军事要冲的军士捐资倡建宫庙、祭祀天后,是视妈祖婆为军队(水师、汛兵等)保护神。因为,康熙十九年(1680 年)妈祖被敕封为“护国佑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是因为在清军平定台湾时,“(妈祖)神涌潮济师”。^③咸水区军民普遍认为,妈祖海神能够推波助澜,济军御敌。

福安淡水区妈祖宫庙的鼎建,行商坐贾的资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次是邑内知识精英的倡导。福安淡水区的内河有东溪、西溪、交溪、秦溪、廉溪等,位于交溪中游的龟湖边上是官方祭祀之地——龟湖山天后宫,宫内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二年八月的《天后宫祀典田亩碑记》载:“福(安)邑宫殿,众商鼎建于龟湖山巅。颇具杰特之观。”天后宫正殿悬梁上墨书“建庙董事”中包括商人张成联、胡性美、郭生泰、邱捷伦、周宗计、郭志升、蔡云龙等 7 人,另包括监生郑殿膺、陈最、李见龙、阮纯仁、周家礼、郑殿诏、郑文谟、陈士尚等 8 人,庠生周中规、李希藩、吴岱、林天宠等 4 人,另外庠宾陈文剑、乡耆陈性顺等人。建于福州城南台惠泽境的福安会馆“中祀天后,旁为邑人客闽者旅馆。同治七年,董事李常荣等十三人,倡募重建天后庙并韩阳公所。”^④福安会

^① 俞孟中、黄亦钊:《沙江村民的妈祖崇拜调查资料》,未刊稿。

^②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十七,《武备》。

^③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④ 光绪十年《福安县志》卷之十七《公署》。

馆主要是福安商人聚会之处，也是士子赴考的旅次之地。馆中建有天后庙，足见商人、士子对妈祖婆的虔诚之心。妈祖婆不仅保淡水区四境宁靖，还是淡水区的商业保护神，可为商人们的市场进取保驾护航。同时，又护佑淡水区学子们的仕途经济通达无阻。

清代在福安淡水区众内河之中，商船丛集、货物囤积、商品流通频繁的当属廉溪。其沿江设立多处码头、集市，是闽东、闽北、浙南的商品集散地。廉溪中游设有富溪津市，明万历《福安县志·輿地志·集市》载：“富溪津市，在二十二都廉村，旧名石矾津，鱼盐之货丛集，贩运本县，上通建宁。旧设巡栏，今设官牙，以平贸易。”廉村对岸建有富溪天后庙，今存富溪天后庙残碑云：“富津地属要冲，建（宁）、邵（武）、宁（德）、罗（源），并本邑商船贸迁有无者业集于此。”廉溪上游穆水设有穆洋市，万历又载：“穆洋市，在二十二都，盐货从富溪津过者，居积于此。盖廉溪之上游，亦泰顺、寿宁、政和、松溪、浦城之喉舌。”穆洋码头的妈祖庙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①廉溪下游为赛江，是福安河流的“半咸淡”之区，因与赛江连接的白马河是福安唯一的咸水河，每涨潮时，白马河水涌入，赛江水变咸；每退潮时，白马河水泻下，赛江水复淡。赛江设赛江市，其赛江码头也建有妈祖庙，从现存的资料看该地妈祖庙至少在清同治年间已经存在。以上妈祖宫庙，大多是商人筹建的。今穆洋市、赛江市之妈祖庙均已废圯，尚存的富溪天后庙正殿悬梁上墨书：“岂大清乾隆肆拾柒年（1778）壬寅岁次肆月念貳日卯时谷旦鼎建。”张挂在富溪天后庙正殿内墨书于清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木制捐资牌载：“咸丰十一年（1861）起同治三年止，重修天后庙信士乐捐银钱姓名”在这些信士名单中除了赛江天后庙、白石司上天后庙、下天后庙，高岩薛氏祠堂以及当地乡绅、船工外，还有大批商家。包括：赛江泰和号、洪口刘聚成堂、赛岐人和号、濂头书盛号、恒茂仁记、双峰冯荣源堂、周盛号、隆盛号、恒茂义记、恒茂和记、荣泰霖记、刘书元号、咸章号、双麟号、陈敬脩堂、彭双利号、荣泰潮记、合利号、聚利号、新桂号等。根据现有资料，从清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赛江天后庙董事多为外塘人苏姓等和赛岐商家陈姓、金姓等，这是赛岐天后宫董事会人员构成的一贯传统。外塘位于白马河上游南岸，其人擅建船坞制造舟楫并驾舟贩运商货。淡水区商人与咸水区造船驾舟者的联合体，构成了赛江妈祖婆信仰人群的主要组织者。^②

福安交溪上游的长溪支流坦洋溪畔设有坦洋市，光绪《福安县志·疆域》载，“坦洋市，邑北四十里，茶商多集于此。”坦洋村崛起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闽东茶叶贸易重要发展期，是福建省红茶极品——“坦洋功夫”的主产区 and 集散地。“同治五年，坦洋又设茶税局，由省委员督办。”^③足见清代坦洋集市茶叶经济之繁荣。坦洋村天后宫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于光绪二年（1876）。初修、重修均由当地胡、施、吴等姓氏茶商出资。民国二十二年《坦洋施氏族谱》记载了坦洋茶商世家之一的

^① 见现存于穆阳缪氏祠堂的光绪五年《穆水天后宫》碑文：“至嘉庆五年，相基择址而庙始建，则告成固有自矣。”

^② 笔者田野考察所获赛岐商人陈氏房契附件。

^③ 光绪十年《福安县志》卷之六《田赋》。

“裕大丰”商号老板施镜波重修妈祖庙的义举：镜波公“承王父志，建祖祠，兴义塾，造桥梁，充义仓，新天后、忠干之庙貌，筑乞子楼，不惜重赀，次第举行。”坦洋天后宫的建筑形制类同于建于福州城内的福安会馆天后庙。其妈祖婆神灵，也是直接从莆田湄州岛分香而来的，当年分香时，所到之处，一路迎祭，整整费时三个月。^①如上所述，霞浦、福安两县妈祖信众的构成和他们筹建宫庙的年代都有明显的差异。

二、置办庙产与祭祀活动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闽东官方每年主持天后春秋祀典的开支并没有列入当年政府税银度支的预算。乾隆《福宁府志·食货志·田赋》载：春秋各类祀典中县级官银开支情况：霞浦每年“春秋祭祀文庙、山川、社稷、邑厉等坛并文公庙及匀增祭祀，共银一百九十一两六钱八分”；福安每年“春秋祭祀文庙、山川、社稷、邑厉等坛并文公庙及匀增祭银一百二十三两二钱。”光绪《福安县志·田赋》在本县每年官银“存留支給”中，将官方祭祀的开支更为细化：“文庙春秋祭祀，银五十三两三钱二分。武庙祭祀，银十八两。山川、社稷各坛备祭，银六十九两八钱八分。文昌庙春秋二祭并增寿诞，银一十八两。”以上总支出官银159.2两，比乾隆年间增加了36两。而民国《霞浦县志·度支志》记载官方祭祀开支金额、项目仍如乾隆《福宁府志》外，另加“嘉庆七年奉文添给文昌祠祭品银一十六两”。以上文中始终不见官银用于天后祀典的记载。福安龟湖山天后宫（官方祭祀天后之所）里的乾隆二十二年石碑证实了天后祀典之需由天后宫自筹解决。该碑名为《天后宫祀典田亩碑记》，碑文既叙述了天后宫祀产确立的过程，又彰显了知县黄彬协调归回天后宫祀产的功德。文曰：

“……福邑宫殿众商鼎建于龟湖山巅……复捐银生息以为春秋享祀、神诞庆祝之需。弟恐積铢锱，权子母，殊非经久之计。”适有慈云寺僧人将本寺田貳顷叁拾肆亩零赁与薛某。“遵照奉文设法募赎之议，请将天后宫生息公银赎回本田，以资祀典。经首事陈维屏、郑殿膺等给银陆百两全僧赎明。事在乾隆十九年三月，夏侯（笔者按：据光绪《福安县志》，即知县夏瑚）任内，具稟立案。因调任会城，未经分管判承。豪强奸佃，乘机争夺。幸逢黄侯（笔者按：据光绪《福安县志》，即知县黄彬）临位，励精可务，废坠咸修。念事神治民，厥政维均。矧天后祀典在定国勤民、御灾捍患之列，尤不可一日缺者，岂容不法之徒兼并吞？爰属督捕方少尹将赎产按亩清釐丈量，除归慈云寺焚修，以壹顷伍拾肆亩贰分陆厘捌毛四忽，缮册用印，给天后宫管业。即以庙器立粮干召良佃耕作，择诚实董事递季公储，变价输课之余，用勤祀典。洵历久不敝之良法！自此黍稷升香，烝尝勿替，灵栖神格，永託湖山。而我黄侯此举，所关诚非浅鲜，其功德亦与之并垂不朽矣！……本宫首事全勒石”

^① 参见蓝图：《坦洋乡村历史地理学报告——近现代华茶贸易与一个村落农民茶叶商帮的沉浮（1842-1949）》（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由此可知，不管是福安还是霞浦，官方天后祀典是由民间出钱、官方出力共同完成的。究其原因，清代国家祀典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分，^①而妈祖的官方祭祀属于“小祀”，^②虽然钦定的天后春秋祀典始于乾隆五十九年，但是祀典的官银开支仍未“奉文添给”。天后宫的日常开支与每年祭祀活动的资金筹措至关重要，天后宫庙须有一笔恒产维持宫庙的开支是咸水区和淡水区妈祖信仰群体的共识。

霞浦咸水区天后宫庙的香灯之需，主要由渔人家族供给。现存于松山渔村“天后行宫”的清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石碑，碑名为《松山澳靖海宫（笔者按：内祀妈祖婆）田园析租赐宫碑记》，碑文中详叙了宫庙恒产：

……壬子（乾隆五十七年）春澳民见神像庙宇亟宜重修，稟明旧管神业，蒙县主许，郡主甄恩为清查本宫田园山并南北两析租息。谕令设簿勒石，转行署县主许立案，俾首事照额轮流接管，以垂永久。

……计开旧管田亩园山南北两析各号地段亩数：

一亩坐落二十五六都洋坑地方，土名‘前丘’，受种一箩，又号土名‘坑园拢’，受种六斗；

一亩坐落二三都江边地方，土名‘新门’，受种八斗；

一亩坐落二三都赤岸地方，土名‘坝尾’，受种七斗；

一园坐落本澳地方，土名‘宫后’、‘宫门前’、‘大坪园’、‘大笪丘’、‘水清园’、‘宫仔后’、‘大宫前’、‘山后’、‘后湾’，各一所；

一旧管南析海地，坐落长表泰子帽，土名‘宫仔’、‘叠石’、‘瓦窑’、‘圭爬’，各一所；

一旧管北析海地，坐落佛堂，土名‘小门’、‘高山北’、‘钓鱼壑’、‘马墓’，各一所；

一旧管本澳网门，坐落火焰山，土名‘崎兜’，共计六口。……本宫首事全勒石。

碑文落款的宫庙首事、董事名单为张姓、程姓、林姓、陈姓等，他们都是松山渔人家族的主姓。

霞浦沙江渔村天后宫现存清道光二年（1822）一月《禁永宪奉》石碑，从碑文可知：沙洽（即沙江）渔村“祖上俞、陈、盛、曾、汤、朋等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间，在前州徐任内，请给东西两崎印照：东至大倪文岐，西至山仔火烧湾，南至清流三屿，北至沙洽横港中沁。其界内纲门土名‘窑前土列’、‘港东土列’、‘角芦屿’、‘自墓’、‘南门’、‘砚稷’等处，共年纳官银八两四钱三分，判佃挂网采捕，租归该村天后宫作香灯之用。……”俞、陈、盛、曾、汤、朋是沙江渔人家族主姓，他们将各自族产海埕无偿给予天后宫为业，作“香灯之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沙洽俞氏宗谱》内

^① 参见《清史稿》卷八十二，《祭礼一》。

^② 参见张宏民《国家祀典中的妈祖》，载《两岸学者论妈祖——闽台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77-283页，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1998年版。

载《俞家起基海埕形图》，图中文字署明：“自康熙年间，业许天后宫，给有渔、粮，由单为据。”可以为旁证。

福安淡水区沿江集市的天后宫庙也置有庙产，福安龟湖山天后宫便是明证。现存福安廉溪上游穆洋镇缪氏祠堂的《穆水天后宫》碑记载了自清乾隆至光绪的近百年间，天后宫信众捐资生息、鼎建宫庙，庙田出典、重修宫庙，赎回典田、重置庙产的全过程：

……本村天后宫，自乾隆四十九年，某等先人虔诚捐资，轮流生息。至嘉庆五年，相基择址而庙始建，则告成固有自矣。而肃庙貌以定神栖，炉火更不可阙，是以余公讳其政者，乐善好施，舍田数亩，作本庙香灯祀典，遂赖以不坠焉。无何圣母寿诞，袅篆常清，而年湮代远，庙宇罔肃观瞻，前廊后寝半皆倾圮。尔时，首事目击心伤慨然，有志修举，又因工程浩大，费用浩繁，庙内并无别矣。无奈将庙田估价出典，以为修整之需。此虽首事一时权宜之计，亦有举莫敢废之理？故如是也。兹幸明神呵护，某等锱铢充积，所有出典之田俱已赎回，特以各契递年交管。恐日引月长，未免有遗漏之处，故建议将现管田亩地墩秤数，暨给照之葛南坂园坪，勒载碑石，以垂久远。庶使后人得以一览而知。至庙内尚有续置产业，以及公项钱文，各首事子孙务以同心协力，共襄盛举，以承先人之志，毋得觊觎致干咎戾，是某等所厚望焉。

大清光绪五年己卯岁次秋八月董事等 仝立

清同治六年（1867），福安廉溪下游的赛江市天后庙的置业过程较为复杂，天后上下庙董事由外塘、赛岐商人主体，他们协议，除了原属上下天后庙管业的店铺仍然归天后庙外，再由公众中抽出店基两间与杨家对换坞埕，在坞埕设立牙行，供停泊船艘之用，收取租金。“嗣后，店归杨家收租，坞由两庙动用。”⁵⁰余年来双方毫无异议。由于当年“分约内有载及，向后杨家船坞或有受买，其杨家店地基贰间仍归还上下庙分收云云，则双方原业显系暂行抵用，当有丝连未断之意。”到了1920年，因坞埕用地被“凭空影占”发生纠纷。次年，经县政府判定，又经协商，坞埕重归杨家，店基仍属天后庙管业。^①在为天后宫置产业的过程中，霞浦咸水区与福安淡水区的信众们显出同样的热心与慷慨。咸水区的渔人信众多以族产捐出，而淡水区的商人信众除了出资外，为了庙产增值，采取了更加灵活多样的手段。

每年官方春秋天后祀典分别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生日和农历九月初九日天后升天日举行，官方天后祀典隆重、庄严、肃穆。光绪《福安县志·典礼》中刊载了《祭天后礼》的全部程序与内容，并同时作了说明：“今闽省、府、州、县致祭天后庙，有用朝服，行三跪九叩礼，后殿行二跪六叩礼，与《通志》不符。或咸（丰）、同（治）以后议注别有更尽，县署既无成案可核，未知何据？兹仍照《通志》，以俟查考。”表明闽省、府、州、县各级官方天后祀典尚不规范统一，只等假以时日才得完善。民间天后祭礼更没有统一的程序与规矩，不管是咸水区还是淡水区都丰富多彩，别出心裁。

咸水区渔村祭祀天后活动只在三月初三日天后神诞日春季进行，是沿海渔事活动的

^① 笔者田野考察所获赛岐陈氏房契附件。

特殊安排，是一年安澜和丰盈的企盼。不同渔村祭祀天后有不同的方式，最典型的祭祀活动有“阿婆走水”、“抢水”、“肥水”等，这些活动富有表演性和娱乐性。民国《霞浦县志·礼俗志·春令俗》载：“（三月）二十三日，竹江乡天后神诞。报赛之日，乡人俟潮涨时，舁神舆沿流而走，走至沙垵水渚处，接舆向水面放落，旋复抬起，上下起落，如三十六次，谓之‘安澜’，盖以波澜汹涌，藉神力以安之。而必以三十六次者，盖以一年三百六十日也。俗呼‘阿婆走水’，未免褻渎。”《霞浦县志》又载“抢水”之俗：“富足乡（笔者按：渔村）祀天后神。迎神赛会，各福户扈驶逐队争先，必遍游所辖境一周。唯舁神舆之夫，必须选福户中之强健有武力者十八人。抬走如飞，将回盃，则别有多数壮男子俟宫外，冲撞神舆，务使之跌坠，或群纤之，使其难于走动。争撞之厉，甚至斗殴有受伤者。总之，皆不许神舆容易回宫之意，俗称‘赛轿’（笔者按：“赛轿”即“抢水”）。果若是，而是年耕山、钓水、利市必倍常，抑亦奇矣。”沙江（沙洽）渔村的天后祭祀异常隆重，沿续多日。每年三月二十日，按惯例渔人为天后神像换袍服，袍服为信士制献，一年一换。上午天后换新袍，下午神戏开台。二十一日“迎老爹”，纪念福宁知州徐必遇，“老爹”即指徐必遇。渔人中选取六秩以上、福寿双全的男性扮演“老爹”，按知州礼仪巡游四境。“徐必遇，监生，辽阳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①传说徐赴任时取道海路，遇雾迷航，幸得沙江天后灯指引。嗣后，徐必遇馈赠天后宫神牌1面，正面署“敕封护国天上圣母神位”背面署“大清康熙庚午年（二十九年，1690）福宁知州徐必遇敬叩”。此神牌保留至今。二十三日“阿婆日巡”，二十六日“阿婆夜巡”，均抬妈祖婆神舆巡游全村，以得“肥水”。这时戏班表演的天后神戏达到高潮。二十七日“阿婆走水”，习俗类似竹江渔村。^②

总之，咸水区渔村祭祀妈祖婆活动，不惜重金，尽心尽兴，娱人娱神，富有象征意味和戏剧效果。特别是“抢水”仪式更显示了渔人迎风逆浪，奋勇进取的精神企求。民国《霞浦县志·名胜志》载清道光中训导赠奉政大夫张光孝语：“……神于江即江于神，渔民能不欢忻鼓舞，醴金为会，以神我江神耶！惟其序际三春，人人焚香荐肴。”

福安淡水区祭祀妈祖婆均以巡游乡境为主，以清代商品流通频繁的廉溪沿岸的集市天后宫庙为例，所有的集市、码头的妈祖婆祭祀仪式，都选定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婆神诞日。上游穆水天后宫信众先在穆洋集市的龙首桥头恭迎湄洲妈祖庙接回的香火，道士们举行乡村平安大醮，随之信众抬出宫内妈祖神舆巡游穆洋十八境，另在穆水溪中开出巨型纸船，船内堆满金铂，百余艘小船（本地称为“溪艇”）簇拥两边，穿行水中，最后点燃纸船，以求商船出航波平浪静、一帆风顺、生意亨通。中游富溪津市的富溪妈祖庙祭祀活动类似于穆水妈祖庙，唯一不同是信众们抬出妈祖神牌巡游乡境。下游赛江市妈祖庙的祭祀活动也基本类同，不同点是专门以一艘大船，船中化妆诸位神灵，在锣鼓声中畅游赛江。以上淡水区妈祖婆祭祀中均突出了妈祖婆巡游江河的环节，因为内河在闽东腹地的商品流通中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定期祭祀外，龟湖山天后庙尚有专门

^① 乾隆：《福宁府志》卷之十五，《秩官志·知州》。

^② 俞孟中、黄亦钊：《沙江村民的妈祖崇拜调查资料》，未刊稿。

因商事而举行的天后祭祀仪式。福安商会馆与龟湖山天后庙仅一墙之隔，清代福安是闽东茶、麦等农产品主产区，一旦三春茶季或仲夏麦季时，商会必集众商先行祭祀妈祖婆，再将货品从洋头码头装仓起航。到了盛夏黄花鱼汛期，商人们也会在龟湖山天后庙祭祀后，再将来自咸水区官井洋的大宗鱼货卸船分发内地。^①

三、结 语

总之，闽东妈祖婆信仰与水的存在（不管是咸水或淡水）息息相关，其咸水区与淡水区的妈祖婆信仰各具特色。因闽东咸水区与淡水区妈祖婆信仰主体人群的不尽相同，其信仰动机也稍有差异，体现了我国民间信仰事项中固有的特征，即人们信仰动机之平民化与功利性。再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咸水区与淡水区之军人与文人的分别介入，使得闽东妈祖婆信仰又平添了几分官方色彩和国家意识，这是妈祖婆信仰与民间信仰中其他神灵崇拜的不同之处。民国《霞浦县志·祠祀志》转引了乾隆年间知府李拔文章：“乾隆二十一年间，学士西蜀周煌等奉使琉球，途遇大风，舟已濒危，望见明灯，旋即得济。其他官军、商贾往来海上者，罔不叠见显应，呼为‘妈祖’。”民间信仰形成的动因之一是人们在命运自救与被拯救过程中的一种启迪与“觉悟”。诸如此类的传说反复传诵，逐步增强了官员、官军、商贾对妈祖神灵的信任感与依赖感。渔人的生活经历使之成了妈祖信仰的原创群体，商贾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了推广妈祖信仰的主导群体，而文人、官军则是妈祖信仰的官方代言人。

不管闽东咸水区还是淡水区，妈祖婆信仰的精神文化生活都离不开信仰群体各自的经济生活，因而在各自的妈祖婆祭祀中他们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仪式思维与行为模式，他们都能在仪式象征的过程中实现人与神、人与人（包括官方与民间）的亲合力，并培育起一种民间信仰所独有的普世性、实践性的宗教伦理与道德情感，同时还点燃了未来希望、吸取了生存能量。渔村不同于农村，在封建时代，农产品主要自给，而海产品更多是交易，因此，咸水区渔村与淡水区集市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地理上的海河沟通，而且还涉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互动中，以霞浦与福安为代表，闽东妈祖婆信仰从咸水区到淡水区，随着封建时代海洋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流动。

（责任编辑 于 光）

^① 以上资料根据笔者实地调查了穆阳缪氏祠堂管委会、富溪天后宫、福安龟湖山天后宫管委会的记录整理汇编。